

别让“诉讼掮客”游走在法律边缘

本报通讯员 冯伟祥

每遇到重大交通事故或刑事案件,就有些人自吹与某领导关系好,熟悉司法程序,能化险为夷“搞定”案件,这类人被称为“诉讼掮客”。

笔者在采访中发现,类似的诈骗案时有发生,“诉讼掮客”在不少地方存在,且有一定的市场,既严重损害案件当事人及其亲属的权益,又破坏了司法机关公信力。

2008年5月14日,缙云县的郑某因妨害公务被县公安局刑事拘留。郑的妻子胡某心里很着急,便找到了蔡春松请他帮忙。蔡春松遂找吴碧辉、林辉商议,吴碧辉声称可以帮郑某在公、检、法疏通关系,但需“活动经费”,郑妻分四次向吴等支付11.5万元。

这三个人拿到钱后,并没有为郑某疏通关系。当受到胡某怀疑并要求退款后,三人即进行策划并分工,由吴碧辉列举购物清单,由蔡春松、林辉着手私刻印章、购买收据及制作虚假购物票据计12万元,企图掩盖诈骗犯罪事实。

花了这么多钱,郑某还是没有被判缓

刑。2008年9月24日,郑某被释放回家。他听妻子说找“诉讼掮客”的事后,火冒三丈,迅速向警方报了案。

不久前,缙云县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蔡春松、吴碧辉、林辉犯诈骗罪。经过一审、二审,法院最终以诈骗罪,分别判处蔡春松、吴碧辉有期徒刑五年、两年六个月,判处林辉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对上述三人处以罚金。

腐败背后常有掮客身影

近年来,浙江查处了一些法官受贿案。笔者注意到,这些司法腐败案件中,除了有的律师搞灰色代理向法院行贿,也出现了“诉讼掮客”的身影。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制

约机制,有些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谋取私利,最后成为了阶下囚,身败名裂。至于那些“诉讼掮客”从中截留了多少“疏通费”,则难以估计。

随着规章制度的健全,法官在办公室私下会见当事人受到了严格限制。但是,仍有一些法官在法院外面(比如说饭店、茶室等场所)与当事人托请的掮客见面。一些“诉讼掮客”与法官之间形成了利益链。不久前,浙江某法院6名法官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原因就是收了“诉讼掮客”的钱。

“诉讼掮客”在不少地方存在,其行为相当隐蔽,既严重损害案件当事人及其亲属的权益,又破坏了司法机关的声誉,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公信力。

“诉讼掮客”处于监管盲区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诉讼掮客”这个灰色的群体?浙江省诸暨市检察院有关负责人介绍说,由于我国的诉讼法律法规对委托代理人资格的审查、限制规定不够严格,除了律师等专业人士依法代理案件以外,往往会有“钻空子”的“诉讼掮客”冒充当事人的亲属、朋友参加诉讼活动,以打官司需要

花费为由,大肆诈骗当事人的钱财。

“打官司就是打关系”,笔者在调查中经常能听到这句话。不少人在亲人涉嫌犯罪被采取强制措施后,首先不是找律师,而是想方设法找关系,千方百计花金钱,为“诉讼掮客”的存在提供了土壤。一些当事人或家属一方面聘请了律师,另一方面也在花钱托关系。

走后门、找关系的心理一定程度上为“诉讼掮客”们的行为提供了市场。“诉讼掮客”正是利用了当事人不懂法律的弱点。而个别律师见利忘义,担任着代理人和掮客的双重身份,以向公检法承办人或领导疏通为由,变着法子向当事人要钱,数额动辄上万元,由于没有证据(不开具票据),难以认定。

“对于律师和法律服务工作者,司法行政主管部门可以通过行政处罚手段进行约束整治,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是,由于行业管理权限的原因,对上述人员以外的社会人员的这类行为进行规范还缺乏法律依据。”一位司法局的官员分析说。

一位执业十多年的律师说:“对上述行为,司法局管不了,工商局也不好管。这给正

当合法的律师执业环境造成了很大的损害。”

规定无力掮客时常现身检察院

去年下半年,一些省市出台了关于依法规范民事诉讼活动中公民代理的若干规定(试行)。这份文件,对规范公民代理法律服务行为将起到一定的作用。

一些地方注意到了“诉讼掮客”现象,已经采取了应对措施。像浙江省诸暨市检察院就设专人提醒当事人防范“诉讼掮客”。每个到诸暨市检察院办事的当事人及其家属,公诉科的检察工作人员会不厌其烦地提醒他们注意防范“诉讼掮客”。

据该院检察员王某说,她经常发现一些陪当事人或者家属来检察院询问案情的人中,会有几张熟面孔。有一次她私下向一位当事人问这个“亲戚”的具体情况,没想到当事人一问三不知,只说是别人介绍的,自称在检察院有关系,可以帮忙。

据了解,诸暨市检察院在设专人提醒的同时,还出台了《关于依法维护刑事诉讼参与人权利的若干规定》,对刑事诉讼参与人全面履行告知义务,以免当事人因不熟悉法律程序而受骗上当。

指挥部买手机岂能让个人买单

洛阳市涧西区法院一审判决洛阳市西工区政府偿还借款

本报讯(通讯员 韩璐)近日,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审结了原告孙学标诉被告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政府王城路办事处、被告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政府欠款纠纷一案。一审判决被告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政府王城路办事处向原告孙学标偿还借款41000元,被告西工区人民政府对上述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1996年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政府成立指挥部(以建设开发洛阳市凯旋西路),原告承包了凯旋西路商业街的部分工程项目。在施工初期,指挥部由于工作,经集体研究向原告孙学标借款41000元,并出具了借条。之后,被告的指挥部用该借款购买了几部手机。因无法下账,指挥部多次与原告协商以追加工程项目的名义偿还借款,原告同意。1996年3月28日指挥部与原告签订《协议》一份,载明:“甲方为指挥部,乙方为石化工程公司,约定:把所变更的基础和其它因素共计人民币41000元,一次包定,任何一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增减工程价款。如单方违约所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与法律责任应承担。”落款处甲方指挥部加盖了公章,乙方代表孙学标签名未加盖公章。

协议签订后,指挥部将原借款条收回,并销毁。1996年4月22日洛阳市石化建筑安装公司在原告书写的《协议情况汇报》上,签写了“此款属于个人借款,同意孙学标自负其责”的字样。洛阳市凯旋西路的建设开发工程

已于1996年底结束。现西工区政府已将指挥部撤销,指挥部的债权债务也移交至王城路办事处。移交的债权债务中不包括对原告的借款。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西工区政府成立并撤销了指挥部,在指挥部履行职务期间,经集体研究向原告借款购买手机。指挥部借款购买手机的行为属于违纪,已经受到纪检部门的查处。向原告借款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本案借款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告请求被告王城路办事处、西工区政府偿还,本院应予以支持。现西工区政府已将指挥部撤销,并将原指挥部的债权债务已移交至王城路办事处,被告王城路办事处应当承担偿还原告借款的责任。被告西工区政府在撤销指挥部时未对原告的此笔债权进行移交,应当承担连带偿还的责任。

变更工时制:加班成“白干”?

郭敬波 许国君

批复:改变职工的工时制

受理。

要发工资了,在浙江省宁波市一家进出口公司工作的刘丰(化名)等人在心里盘算着,这个月加班不少,可以拿到一笔数目可观的加班费了。

可工资领到手后,刘丰却发现加班费没了。怎么会这样?刘丰和公司领导交涉,公司领导告诉他们,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经批准实行不定时工时制的职工,不受劳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日延长工作时间标准和月延长工作时间标准的限制。对实行不定时工时制的员工,只有在法定休节假日工作的,按照不低于劳动者本人日或小时工资标准的300%支付工资,其他时间均不视为加班,企业也不支付加班工资。“你们这些人的岗位都实行的是不定时工时制,所以,不能视为是加班,公司不发加班费,是有‘法律依据’的。”

对公司的说法刘丰无法接受,刘丰认为当初与公司约定,岗位实行的是标准工时制,怎么无端的就变成了“不定时工时制”了呢?

公司领导拿出一个当地政府劳动部门的《批复》。批复上写明:批准该公司对19个岗位实行不定时工时制的申请。公司领导说,这是政府的决定,不服你们找政府理论去。

诉讼:矛头转向劳动部门

刘丰等人找到当地政府的劳动部门,劳动部门认为,不定时工时制是针对因生产特点、工作性质特殊需要或职责范围的关系,需要连续上班或难以按上下班,无法适用标准工作时间或需要机动作业的职工而采用的一种工作时间制度。该公司申请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的岗位符合原劳动部发的《劳动部关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审批办法》第四条的规定;另外,公司的申请手续有“职工代表”的签字,申请程序也是合法的,劳动部门进行审批,是依法行政,并不存在过错。

在公司的申请手续上,刘丰等人看到了三个“职工代表”的签名。但刘丰说:“我们并没有选举这三个人当代表,他们有什么权利‘代表’我们签订职工‘同意’的意见呢。劳动部门对此审查不严,才作出了错误的批复。”于是,一纸诉讼将劳动部门诉至法院。

法官:不应提起行政诉讼

法院经审查认为,刘丰等人认为用人单位应付而不付加班费,与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此,起诉人不具备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裁定对刘丰的起诉不予

郑州出新规: 检察官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

本报讯(通讯员李承锦 记者肖树匠)9月16日上午,记者从郑州市检察院召开的案件质量座谈会上获悉,今后将实行检察人员办案质量责任终身制。按照规定,检察人员要对所办案件的质量终身负责,如出现问题,将被追責。

据介绍,办案质量责任终身制度,即从检察人员自办理案件之日起计算,实行终身负责制。具体方式是,检察官在依法办案的同时,要认真填写所办案件的案件运行表,签署个人意见,将案件运行表放入检察人员业务档案,对所办案件质量实行终身负责;如因案件质量出现问题应给予相应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按照规定,郑州市检察院于将对2007年以来办理的案件质量进行全面复查,衡量检察干警案件质量的指标体系涵盖了办案实体、程序、安全、效果四个方面,该指标体系与绩效考核、办案责任相结合,一旦在办案中发生超期羁押、上访事件、办案安全事故、无罪判决、错案等严重违法违纪现象,或者要结果案件,督察督办案件不能按时完成的,直接追究承办人和办案部门单位的责任。

山西打掉35个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团伙

据新华社电 今年以来,山西省各级公安机关在三晋大地掀起一场“打拐”风暴。截至目前,打掉重大涉嫌犯罪团伙35个,抓获犯罪嫌疑人317人,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408人。

据山西省公安厅刑侦总队队长段绪忠介绍,专项行动中,山西把城市打击的重点放在组织操纵未成年入犯罪和强迫被拐妇女从事色情服务上,在农村打击的重点放在贩卖儿童和拐卖妇女犯罪上。各地认真落实快速反应机制,做到接警快、处置快、出警快、围追堵截快,确保现发案件得到快速处置。4月初,山西岚县公安局根据群众反映的线索,快速出击,在县城某旅店一举抓获正在买卖被拐妇女的邵会保等5名犯罪嫌疑人,当场解救2名被拐卖的公民。4月20日下午,太原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根据群众报案,立即组织警力展开侦破,24小时破获一起强迫被拐骗妇女卖淫案,抓获4名犯罪嫌疑人,解救被拐骗妇女1人。



秦皇岛 公诉传销犯罪嫌疑人

本报讯(记者王贵元 通讯员朱润胜 李惠军)日前,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检察院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对付某、王某、陈某、刘某等4人提起公诉。据悉,这是今年2月28日开始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新增“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之后,河北省检察机关首例以这一新罪名提起公诉的案件。

今年5月8日晚,秦皇岛海港公安分局民警在巡逻时发现一男一女形迹可疑,民警进一步盘查发现,与其同住一处的还有3名男子,而他们居住的室内墙上,挂着“发展人员流程图”以及传销宣传材料,他们随后被带到公安机关审查。

经审查,其中4人确系在秦皇岛组织传销人员。自2006年开始,他们以推销上海“蔭尔妃”、“心诺”化妆品为名进行非法传销活动,其中付某是这一传销组织在秦皇岛地区的总负责人,4人同为“B级”即经理级人物。该传销组织在秦皇岛已发展传销人员500多人,涉案金额达145万多元,为近年来该市打掉的涉案人员最多、涉案金额最大的传销组织。

据了解,该传销组织并没有实际商品,完全以拉人头、交入门费的形式聚敛资金。凡交纳2900元的视为购买一套化妆品,可以“入门”成为业务员,业务员发展3至9名人员的提升为主管,发展10至14人的升为主任,层层累计发展91人的可升为经理。

劳动领域“王海式”维权的是与非

可夫

找到一家工厂干一两个月后便借口辞职,然后找到工厂的管理漏洞挑起劳动争议索赔,从去年以来,广东省中山市已经有6家工厂被同一名打工仔小谭告上法庭。报道这一新闻的媒体认为,这属于“劳动者极端维权”,暗示“在激增的劳动争议案件中,不乏蓄意挑起劳动争议牟利的个人或群体出现”,并称“法官提醒劳动者应该理性维权”。

笔者认为,劳动者滥用诉权与企业打官司固然不可取,但小谭的做法似乎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非理性维权,倒是更像消费领域里有名的“王海式”维权。

据报道,去年以来,来中山的小谭先后在不同镇区的6家工厂打工,每家工厂做了一两个月,就找个理由辞职,然后一纸诉状将工厂告上法庭。首先,这表明小谭具有法律知识和维权意识,知道工厂在哪些方面存在侵权行为,懂得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作为一个势单力薄的劳动者,能做到这点很不容易,也令人钦佩。其次,小谭的维权行动对当地企业的侵权行为是个威慑。从去年开始至今,小谭先后提起6次劳动争议诉讼,索赔少则千元,多则三四千元,一审判决有输有赢。法院既然判决小谭赢,

说明工厂确实存在侵权行为,输了的厂家今后在这方面至少会有所顾忌。凡是判决小谭输的官司,他都要继续上诉,他的锲而不舍精神,对被告的继续侵权冲动多少会起到一些抑制作用。再次,小谭的维权方式不但为自己争取到了合法权益,对同在一个企业打工的其他工人的权益也是一种间接维护。他就工厂存在的某些漏洞打官司,必然会促使厂方采取措施堵塞漏洞,否则其他工人也可能就这个漏洞跟企业打官司,而其他“亡羊补牢”之日,就是工人权益得到保障之时。

想当年,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观念还没有

深入人心,商家制假卖假现象非常普遍。时有王海等一干民间职业“打假专业人士”,深入商场“知假买假”,借助《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将一个个“制假卖假”的商家告上法庭,一时间使无数商家不得不抵制假货,守法经营。他们的行为,对于我国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起到了启示作用。

看如今,劳动者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虽然在不断充实完善,但一些用人单位侵犯劳动者权益的现象仍然时有发生。在这个背景下,应该正确看待劳动领域出现的这种“王海式”维权现象。